

新时代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的前沿问题 及研究趋势*

任 珺

(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 广东 深圳 518028)

[摘要] 当前我国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内容, 既有全球性的命题, 也有许多难以借鉴西方经验的中国实践议题。其问题意识及研究趋向, 始终与新时期以来国家文化政策及文化体制改革实践有着内在的联系。我国艺术管理实践所积累的经验, 为深化文化政策及渐进式文化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文化政策为协调艺术管理的内外关系作出具体规定、策略和计划。阐释相关概念、对象及环境的变化, 探讨技术发展进程带来的深刻影响, 重新关切艺术人文性本质特征, 这些对艺术内部生态及外部环境时代变迁的关注, 决定了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的问题意识和研究主题。种种新形态新问题亟需传统艺术管理变革, 管理理念及政策规划也亟待与时俱进地做出调整优化, 以最终实现艺术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目标。立足于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领域的共性特点、发展规律和社会功能, 揭示中国学界需要重点深化: 文化融合与创新、创意与人文经济、文化治理现代化、文化可持续发展等研究范畴。这些范畴既来自于中国的实践经验, 又吸收借鉴了国际社会普遍聚焦的论域, 对于今后指导实践、开展国际学术对话具有重要意义。从宏观、整体性视角来看, 未来艺术管理的创新实践应投向长期可持续乃至社会整体发展, 连接历史、当下及未来。

[关键词] 艺术管理 文化政策 问题意识 创新实践

[中图分类号] J0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83X(2024)04-0130-10

当前我国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内容, 既有全球性的命题, 也有许多难以借鉴西方经验的中国实践议题。这是因为我国艺术行业在运营计划、组织、实施、监督和控制五项管理功能过程中, 其管理思想、管理组织、管理方法和技能等, 与欧洲及北美同行有共通之处, 亦呈现出不同的价值优先及制度适应性特征。要解决艺术管理发展中提出的新问题, 就必须使理

论进步跟上实践脚步。以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 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 培育判断相关议题学术价值的长远意识, 指导并促进我国文化艺术领域可持续发展。本文将重点结合全球与地方的视角, 探究相关领域学术与行业前沿热点问题、实践中的问题意识、研究动向及其社会价值, 陈述对新时代我国艺术管理理论、政策与实践的思考。

收稿日期: 2024-03-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一般项目“文化艺术资助机制及政策研究”(15BH111)

作者简介: 任珺, 研究员, 主要从事文化政策、文艺美学、文化理论等研究。

一、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兴起的历史动因

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学术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北美、欧洲艺术管理培训与文化政策研究的形成。^{[1](P19)}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同政治体制的国家均从不同层面加强了对文化艺术领域的有限干预。国家层面表现在:其一,各国政府加大了对文化艺术领域的公共投入和资源分配;鼓励社会投入及激励商业与艺术之间的联系,为文化艺术发展引入多样化的资源支持。即便一向被认为低福利的美国,其联邦政府自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也开始资助公共图书馆系统发展,出台系列法案规定联邦资助的规模、方式和途径。其二,艺术资助机构得到政府资金支持。比如英国大不列颠艺术委员会(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1946)和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1965)等相继成立,成为直接进行艺术支援和服务的非政府部门公共机构(Non-Departmental Public Bodies),为艺术组织和艺术家提供创作或项目资金。其三,各类文化艺术机构及其社群组织开始大量兴起,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音乐厅、剧院等文化场馆数量迅速增长,各种艺术协会、艺术基金会及文艺社会团体得到广泛发展。

国际层面,196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二十四国文化圆桌会议”,在此会议上首次给文化政策作了一套操作性原则:“首先,文化政策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社会为了满足特定的文化需求,通过一定时期内可以取得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最佳利用,而制定的有意义的、特定的措施,以及干预的或不干预的行动的总和。其次,应确定文化发展的标准,这一标准需将文化与人的实现以及经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2](P10-11)}文化圆桌会议鼓励国家层面的文化行动,也提醒一切消极或积极性的干预行动不能违反创作自由的基本原则。这一行动理念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文化政策和项目中一

直延续。至2022年9月“世界文化政策与可持续发展会议”在墨西哥城召开时,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93个成员国参与确定该领域未来的公共政策。文化政策成为政府直接干预文化领域的重要手段或工具,通过政策话语和制度运作,文化政策借助行政管理力量来实现对社会的文化治理。^[3]除了国际共识,各国显性的文化政策(explicated cultural policy)或隐性的文化政策(implicated cultural policy),以及特定时期政策背后的价值取向与利益选择,对该国艺术组织和机构的定位、功能及发展,均发挥着规制或倾向性引导作用。同时,伴随艺术组织和机构走向科层化管理、艺术组织/机构与国家软实力的密切关联,催生了应用领域对实务技能、职业素养和专业培训项目的需求。由此,有关知识也逐步进入高等教育课程,及智库应用型研究领域。

因应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的时代形势,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逐步进入我国学术视野。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至今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智库平台建设,均颇有规模。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相关研究成果及艺术管理人才的旺盛需求是息息相关的。其问题意识及研究内容,始终与新时期以来国家文化政策及文化体制改革实践有着内在的联系。故有学者认为我国相关研究具有非常明显的实践推动性和政策驱动性特征。^[4]我国文化领域法治进程较为滞后,当前的文化立法效力层级普遍偏低,主要以行政规章和地方性规范性文件为主。由此,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之间的关系尤显重要。艺术管理实践所积累的经验,为深化文化政策及渐进式文化体制改革奠定了基础;文化政策为协调艺术管理的内外关系作出具体规定、策略和计划。两者互为促进共同发展,为我国文化传承发展、文化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提供了有利的文化条件。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当前相关的理论研究越来越难以指导和解释艺术管理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

困境。对于实践中的难题及所涉及的复杂社会问题，相应的对策研究不足，理论指导也缺乏实际操作价值。^[5]未来研究亟须整合跨学科相关理论，以中国艺术管理现实问题和实践需求为导向，紧扣新时代特征和创新意识，密切跟踪国内外艺术管理政策学术发展和实践前沿，创建新的研究范式。通过案例观察、实验或调查，典型性的比较研究或实证研究，收集信息资料或量化数据。系统分析：1) 艺术行业的体制构成及其运行规律、普遍遭遇的困境和难题；2) 艺术组织/机构的功能及与观众、社会的互动关系；3) 新技术在管理和传播上的创新运用等。以事实为证据，研判新时代管理策略、资源融合、数智运用、机构运营、观众组织等发展趋势。及时回应新时代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所面临的挑战，不断提升文化艺术机构积极适应和引领变革的能力。

二、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的问题导向及研究内容

(一) 阐释相关概念、对象及环境的变化

面对艺术观念与审美趣味多元化的时代，艺术机制与实践方法在发生根本的变化。与最初发展阶段不同，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需要处理的是更加宽泛、包容的艺术概念。管理/研究对象不再仅仅是美的艺术(fine art)，被纳入非遗范畴的传统艺术、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公共艺术和设计、全球性的流行艺术和商业艺术、地方性的民间艺术等等，均需纳入当代艺术生态的整体视野中。^[6]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艺术创作中的运用，新艺术类型不断涌现，对艺术概念的界定将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之中。现代艺术不再是相对独立的社会领域，而是作为文化和社会过程的艺术。艺术在文化领域内的融合与延伸，直接促发了艺术管理走向文化管理、艺术政策走向文化政策。从组织研究和公共政策视角来看，传统的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内容，涉及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两个

领域。主要包括音乐、舞蹈、戏剧等以舞台形式呈现作品的表演艺术管理，和以美术馆、画廊、拍卖、展会等行业为载体的视觉艺术管理。艺术资助政策被置于文化政策的核心，需要处理的是国家支持艺术议题，以及更多支持资源的介入。现在延伸至艺术教育、文化旅游、传播媒体、历史/遗产、文化外交、文化贸易、城市与区域发展等广泛领域。文化政策的核心内涵没有变——即有关文化产品的生产和管理制度的公共政策——内容却与时俱进地大大丰富了。因此，内部研究需要将相关知识体系、专业化管理技术，与艺术机构及社群组织的现实需要和价值观相结合。处理好世界性创新潮流和地方性审美经验融合发展的的问题，保护传统艺术存续、服务当代艺术创作。解决非营利性艺术行业如何开展标准制定、资源共享、市场培育、行业监管等多方面政策对接问题。解决处于艺术产业链中的艺术机构/组织，如何适应国际艺术传播与贸易规则、应对艺术消费市场结构的变化，其角色、价值与运营革新问题等。我们需要看到不同艺术管理体制的发展及其局部变动，既是长期的文化和政治传统的体现，也是因应新形势新机遇作出的调适。

从外部发展环境来看，文化在公共政策范围内也越来越趋于融合。^[7]文化政策早已脱离艺术(文艺)政策狭义上的理解，日益成为一种综合性政策，需要发挥结构性作用。比如，具体到中国语境，我们可以看到：文化作为一个综合性体系，它在持续传承、培育适应时代发展的艺术生态系统；同时也要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互动，相互支撑形成“五位一体”的中国式现代化总体发展布局。在这一背景下，相应的研究视角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为实践服务的应用性研究不再拘囿于以艺术家为中心的艺术史、审美创作。关注点指向艺术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艺术观念表达走向艺术社会实践、走向艺术对现实世界的介入。艺术管理哲学注重对于社会公共责任的参与。^[8]研究聚焦艺术的社会体制和制度

环境,比方如何推动建设具有参与性的文化治理体系和运营模式;考察文化艺术机构/组织的功能演变,比方如何实现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文化馆功能转换与开发;思考文艺创作于在地文化传承发展中的作用,比方如何开拓传承于审美精神的美育新局面,丰富艺术审美的呈现等等。宏观层面,政府更加重视艺术体制化的意识形态力量、文化机制的文明建构和社会建构、国家软实力的全面提升,及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贡献。微观层面,部分地区文化艺术实践因地制宜推动了社区繁荣与活力恢复,促进了多样化的表达和想象力、社会创新与经济创造力的蓬勃发展。故被视为一项可以提升和扩展城市独特性资产、促进和完善地方文化治理的核心策略。这一策略在国内外创意城市、文化区、历史文化街区建设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运用,通过艺术实践来诠释地方故事,成为城市乃至国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的重要途径。可见,因应艺术内部生态及外部环境的变化,实践领域需要不断调整管理理念及政策规划,最终实现艺术的审美价值与社会价值目标。

(二) 探讨技术发展进程带来的深刻影响

全球以数字化为标志的技术进步和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经济正在加速发展,这给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提出了一系列全新的问题。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中核心的增长极之一。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在中央层面对国家文化数字化建设进行了战略部署,明确首要工作原则是“以人为本,全民共享”。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作为最基本的价值优先观。文化艺术行业数字化转型逐步由单点应用向连续协同演进。这不仅使艺术的生产与消费方式发生了转变,而且艺术和文化组织在组织的结构设计和组织的文化隐喻以及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均发生了变化。^[9]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合成生态、元宇宙等多种数字化

技术,促发艺术创作方式、内容生产模式发生深刻变化,带来文化消费性质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传播格局的影响也显著增加。当代艺术创作走向大众化,人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网络文艺社群等新的文艺群体十分活跃。同时,艺术家不再是单一创作主体,观众参与成为艺术创作和表达的一部分。文化艺术内容生产上更加重视用户导向,因此,也需要密切关注数字技术带来的社会分化和不平等现象。^[3]受众从被动信息接受趋向主动学习体验。数字媒体和虚拟现实技术,提供了多模态、多维度的沉浸式场景,为受众体验从视听觉发展到全感观提供了技术支持。国外即有博物馆“感知转向”的研究,考察多感官互动如何影响观众对于展品和展览的理解;关注以身体(Body)为中心的虚拟博物馆发展,如《多感知博物馆:触摸、声音、嗅味、空间与记忆的跨学科视野》(莱文特等,2014)。对于理论研究来说,“全感体验”如何促发文化创新运作机制、进一步拓展文化功能,还需要在更多实证研究中获得鲜活的经验和启示。

信息技术发展有助于开发能够提升某些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整体效率的方法和工具,可以更有有效的管理体系来实践业务运营。比如,辅助展览叙事的呈现,丰富文物内容的创新性表达与多样化阐释;资源互联与数字化,实现藏品资源开发利用和价值延伸;数智化票务系统等管理服务要素整合、业务系统集成,促进管理效能提升等就是例证。还有,国外发达地区图书馆在整合和驾驭人工智能技术方面做了很多探索,比如使用聊天机器人(Chatbots)、建立限于学校范围的AI治理框架等。数字技术赋能文化传承发展,也为文化遗产的保存与活化提供了重要契机。但艺术管理也面临诸多数字技术应用的挑战。数字化产品具有可复制、易改变等特性,产生的网络侵权盗版等行为、虚假信息和安全问题等,对相关版权管网治网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当前多模态人工智能(multimodal AI)及更多定制应用程序,广泛运

用于创作中的文本、语音、音乐、图像、设计、影视、游戏等,加剧了相关版权归属与保护等问题。更不用说内容呈现上可能会边缘化弱势群体、加深刻板印象和偏见等。当然最让人担心的是看似客观的叙事却可能存在认知干预和观念引导。OpenAI发布视频生成工具Sora以后,引起业界欢呼;一些艺术家则对其可能带来的职业冲击表示堪忧。一方面新技术可以辅助艺术创作;另一方面可替代人工,如何评估艺术品成为问题。有人提出要警惕音乐流媒体平台业务出现的版税分配过低、头部效应和算法偏差等问题。也有人顾虑制作商或平台会因迎合商业需求而限制艺术家音乐产品质量和多样性。文化数字化对升级传统文化场馆信息基础设施提出了要求。定制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的数字场景融合了电影、戏剧、游戏、视觉策展和动态设计等艺术表现,其空间特点与传统的展览馆、表演艺术场所不同,需要灵活的展示舞台和座位安排、创新技术和高速网络提供设备支持等,这些对文化设施投资、组织管理、维护及持续运营成本均提出了挑战。当前新一轮数字技术快速迭代,全球范围内兴起了关于人工智能政策发展的讨论。在人工智能日益融入文化进程的态势下,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增强文化艺术创造力,同时保护创作者的权利、维护文化创新生态,成为亟需关注的问题。稳固人类在文化构成中的主导角色,确保技术发展符合人类价值观,将是未来“后人类”人机协同发展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如此种种,可见技术进步助力艺术发展,新形态新问题亟需传统艺术管理变革——在技术完善与管理规制上发力,需要艺术管理将AI用作协同智能的工具,以适应文化数字化发展的新特点和新需求。

(三) 重新关切艺术人文性本质特征

艺术人文性本质特征,决定了艺术管理和文化政策的人本主义价值取向。在过去几年中,作为公共产品的文化内容、艺术机构/组织使命及与受众建立联系,均回归到:1)对人性需求的满足、提供情感支持,包括对人与自然、社会环

境关系的思考;2)对人自身处境的反思;3)参与到身份和意义、知识及价值观共生关系的建构。国际社会呼吁将文化置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核心地位,倡议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文化权利,从而推动包容性社会发展;发展文化以促进环境可持续性等等。^[10]我们可以看到国际上也有越来越多的艺术机构在处理与社会包容、可持续发展及创新孵化有关的议题。处理艺术管理中组织战略及新的技术与媒介如何实现各阶层文化发展权的问题。总体上注重以人为本、基于实证研究的艺术管理变革。当前国内文化实践领域对可持续发展理念还不足够重视。艺术管理和文化政策尚未将之转化为艺术行业的自觉,但仍可预见未来艺术机构的功能特征及社会角色的变化。新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博物馆/美术馆正践行着从“以藏品为中心”向“以观众为中心”、从“以研究为中心”向“以教育为中心”的转向。这并不意味着文化机构传统的收藏、研究、展览功能不重要了,而是更为强调以公众为中心,建立艺术和社会的关系。通过“探索发现”及“经验和体验”的方式引导公众知识学习、审美与创造,将博物馆/美术馆与人们当下的生活、社会的未来联系在一起。

美国AEA咨询公司(AEA Consulting)持续七年开展的《文化基础设施指数报告》研究显示:尽管博物馆/美术馆仍然是全球范围内最主流的文化基础设施,但贴近公众多元需求的多功能艺术场馆成为新的建设趋势,为公众提供多感官体验的数字化场馆或艺术空间正在各地兴起;许多艺术机构/组织基于各自传统功能,开始对更多功能与服务、新形式创造性合作伙伴关系进行探索。^[11]无论是国际博协,还是国际图协,均以探寻文化机构的多样性并强调服务社会发展趋势,不断对机构角色与价值观念进行修改。文化艺术机构对去中心化运营方式、文化价值观念生产,且转向加强公共领域社会联系等更为关注。当前在中国语境下,重场馆建设、轻运营维护,资金来源单一等问题依然存在,其根本需要回归到艺术人文性本质特

征如何在组织机构运作中得以体现。回答文化艺术机构为谁服务、怎么服务的问题。此外,策展人制度在博物馆、美术馆领域的兴起,肯定了个体经验和人本属性,从“以物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其核心理念亦强调了人对文化意义的阐释和生活意义的构建。长远来看,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AI大模型广泛运用于文化生产趋势之下,重申这种文化主体性将显得尤为必要。近年来,国内各地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深挖地方文化特色、打造融合消费新场景,具备多元、跨业态的功能服务,深受市民的喜爱。其跨部门协同运作、多元主体参与共建模式,有效激发了社会各资源要素活力,充分展现了文化的聚合效应。当下亟需重建人们日常的艺术实践与公共生活,提升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品质。事实上,艺术介入地区建设,无论是在城市更新还是在乡村振兴中都有广泛的运用。其中所发挥的重要功能之一即是基于文化互动和艺术实践,使不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在日常生活切近处激发人们进入公共空间,重建公共性,重新唤起公平、正义、参与、责任、公序良俗等公共价值。这也是实现具有参与性的文化治理体系的关键。

三、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动向及社会价值

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本质上是一种不断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国内学者从艺术管理学科体系和专业建设的角度,展开了对艺术机构功能和组织的系列理论研究或历史研究;探讨了诸多艺术管理如何引领机构/组织更好地承担起社会的适应性角色的问题,以及如何借鉴欧洲及北美的知识谱系、理论范畴和知识框架,丰富了对中国实践的研究和认知。同时,对新时期我国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路径选择、相关文化政策问题及如何处理好文化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等若干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将艺术管理纳入文化产业管理范畴的研

究更是不少,并细分到各个不同的艺术产业或产业链环节。与公共政策密切联系的议题集中讨论:政府规制与市场机制如何协调、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如何结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何平衡等问题。学界亦开始以更为开放的思维、综合的方法及跨学科的视野去思考解决实践中呈现的问题,比如王璜生提出“新美术馆学”以构建新的研究方法、知识生产和学科理论;^[12]张子康从美术馆新角色、智识机制建构等角度挑战传统美术馆既有功能,探讨未来发展趋势。^[13]此外,也有诸多学者从策展和展览制度的角度介入视觉艺术管理的机制创新(如策展人制度、文教融合等)和内容创新(艺术实践+社会实践);从突破机构空间限制的角度,探索艺术审美教育新路径,等等。

以下笔者主要立足于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领域的共性特点、发展规律和社会功能,从宏观、整体性视角将具体的实践研究从溯因式的意义构建,转向更为前瞻性的理论判断,揭示中国理论界需要深化的重要研究范畴,以及这些研究范畴与当下形势和未来趋势之间的关系。这些范畴既来自于中国的实践经验,又吸收借鉴了国际社会普遍聚焦的论域,对于今后指导实践、开展国际学术对话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化融合与创新

20世纪60年代以降,国际社会一直没有停止过充实完善文化政策及相关概念内容,如文化权利、文化遗产、文化治理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充分吸纳了东西方智慧、尊重发展中国家的诉求,突破了西方国家只承认个人人权,片面强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传统人权观的局限;突破了西方国家只承认有形遗产即可传承的物质文化遗产的局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之间的内在相互依存关系,及对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多个国际组织也在国际会议论坛、各种多边文件和研究报告中不断修正相关概念内涵及用法。这些努力是凝聚全球共识、树立跨国合作理念的基础。事实上,各个

成员国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对相关概念的理解和运用也始终处于因地制宜改造或自我调整之中。适应各国国情、符合全球化和转型进程的艺术管理模式、文化政策理念和具体运作方式，其形成和发展只能在本土化实践中自主生成。基于文明互鉴的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承认文化主体价值的平等，为国家/民族之间开展新的对话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也为文化融合及创新发展创造了更多有利因素。文化融合与创新发展的逻辑起点是承认差异，尊重文化差异，并视跨界融合为促进社会新知识资源、系统生成革新的发生器。“差异性”和“同一性”是人类共存世界的普遍性，建立“差异统一的共同体”，^[14]推进包容合作及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当前动荡变革的全球大趋势下显得尤为重要。

从历史发展视角来看，文化融合与创新发展是塑造开放包容中华文明特质的应有之义，也是建构共享发展机制的内在要求。从全球整体发展来看，也只有文化主体性与共融性相合一，才能达到文化表现多样性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并存与和谐。具体到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这里“文化融合”可扩展为三方面内容：一是开放包容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文明交流互鉴有助于打破不同文明所固化的思维惯性，从人类整体性视角，融汇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及适应现代生活的创造性转化。二是文化与其他领域的融合，跨界发展、整合资源为“我”所用。文化生产的增量不只依赖于文化领域的投入、流动文化资源的活用，也需要在跨界过程中相互赋能，获取新的发展动能。三是文化机制上的融合，协同共建、提升现代治理能力。文化融合所体现的基本价值取向，对艺术管理和实践目标、方向具有指引性的作用，当代艺术实践也确实带动了社会创新及变革。关于艺术制度造成区隔的问题，时有讨论，学界需要反思如何重塑艺术制度，让艺术回归生活。

（二）创意与人文经济

继“文化”在公共政策实践中普遍运用，“创意”也成为包罗万象的词，涉及艺术、文化、科技、创造力等众多不同领域。1998年英国在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中引入“创意”概念，作为创意工业发展的核心战略，强调藉“个人的创造力、技能和天分”及“知识产权的开发与利用”获取发展动力。此后，多个国际组织分别给创意经济做了界定，并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这个概念。有研究报告总结：创意经济被视为一系列以发展为维度、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活动，包含了经济、文化、社会元素与科技、智力元素和旅游的互动，在产生工作机会、收入和出口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包容、文化多样和人类发展。^[15]可见“创意”的内涵虽然仍与个人的创造力相关，但在更大程度上已是一项集体活动。文化的生成及创新发展是建立在群体层次之上的，文化造就生成知识、技术的群体，因此需要坚持有利于个体发展与有利于共同体发展相统一的发展思路。创意经济体现了国际社会在人文经济学领域的具体实践。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对“文化”在国家现代化发展布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知在不断深化。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倡导人文性与经济性合一——既追求物质富足，也追求精神富有。显然，这是超脱了以“物”为载体的社会客体性现代化，聚焦于以“人”为主体的主体性现代化。^[16]具体到文化产业发展，则以“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为原则，将创新文化表现形态、汇聚文化赋能的发展动力，提至阶段内政策发展目标。近些年在文化与其他经济业态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我国文化产业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行业发展很快。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科技支撑，还是文化赋能，发展人文经济的重点都应落在文化内容生产及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呈现上。同时，发展人文经济也不能违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现代社会在处理“大传统”与“小传统”协调互动关系时，

面对传统模式失效,需要因地制宜地借助发展人文经济来传承、创新文化传统,并将之深切地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建立广泛的文化认同。全球化经济浪潮下,文化主体性建构离不开文化生产及生活方式上的开放包容、守正创新,这正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综上,中国发展人文经济,是与世界同频,同时代共振。促进人文与经济交融互生,需要处于新时代的中国不断在文化事业、产业融合实践中积累新的知识经验和方法。比如,如何以新型生产要素融合科技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生成创新性文化。如何提高传统产业中文化生产效能/质量和文化创新能力,如何处理效率与公平,如何优化文化资源配置等。我们需要在这些经济学面临的普遍性难题方面,为社会提供有影响力的知识生产。

(三)文化治理现代化

在我国,文化治理是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路径紧密相连的概念。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顶层设计,确立了主要领域(包括文化领域)的改革主体框架,并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打破了以往我国文化领域实行单一的、由政府财政拨款支持的事业单位管理体制。这份文件为文化治理实践发展提供了政策保证。文化治理生发的社会环境,运行中政府角色、组织结构、组织形态及体系的开放程度、管理方式等,均明显区别于建立在传统行政逻辑之上的文化管理。主要体现为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基于市场契约原则所形成的文化权力配置和市场交易系统;文化治理是国家文化管理结构中的一部分。^[17]这就决定了文化治理不等同于文化政策,而是一种政策工具或是一种运作策略和方法。同样因应变革传统文化管理制度、激活市场

和社会力量施策,但不同于西方模式以“分权制衡”“市场竞争”为特征,实践于中国的文化治理机制立足公共性和社会效益,以“政府主导,多元协商共治”为特征。

当前我国地方在采用“横向联动+纵向贯通”新型合作模式、制定开放式公共资助计划及鼓励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多元化运营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但也出现了依赖政府财政资金、缺少社会资本持续投入、参与主体培育不足、可持续能力较低、对艺术组织/机构进行宏观调控和间接管理的立法或配套政策缺位等问题。未来,整个人类还将面临更为多元化、多层次的文化生态体系所带来的挑战。文化治理现代化探索需要围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文化主体性,发展多元参与的、开放式文化治理体系。政策与实践领域需要以文化法治规范艺术管理,不断创新文化资源整合协调机制,应对网络和科技带来的新问题,加强公众文化参与机制,建立多维文化信息收集、传递及反馈机制,健全文化公共资助的监督评价机制等,进一步提升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理论创新方面,一是需要对文化治理的内涵及领域、内在机理、运作模式等问题深入探讨,尤其从现实场域拓展到虚拟空间后,网络文化治理共同体建构将成为新的关注点。二是需要研究日益增多的跨区域合作及国际合作背景下,我国艺术管理和文化治理的方法、理念及价值观实践等发展问题。尤其是在联动机制高效运作方面,我们是否能够提供切实的经验和举措。三是需要思考我们的文化治理与发展经验能够为全球文化治理提供怎样的地方性知识和技能、本土文化价值和创新案例。比如在新技术使用方面,如何将AI作为一种协作工具或合作伙伴,提升文化治理现代化和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在基层文化建设方面,如何拓展与公众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多类型公共空间载体,增进社区文化资产,焕发生产的潜能和活力。当前文化艺术组织机构对知识整合、学科融合、科技结合需求日趋见长,艺术管理领域也亟待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源

的综合利用,建立流动性和规制上的弹性,积极迎接更为复合型文化综合体的未来。

(四)文化可持续发展

文化可持续发展是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作为全球公共产品,是文明交流互鉴、跨文化对话的重要内容,如何发展关系到全人类当前及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多样性公约》(2005年)鼓励通过对话、国际合作及本国建立可持续的文化治理机制来提高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的能力。文化多样性保护不仅是消极的原样保存,更重要的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文化的创新,在开放包容的环境下,通过多元融合创造出新的、适应现代社会的表现形式,并积极“走出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杭州宣言:文化与可持续发展》(2013年)中,倡议将文化纳入所有发展政策和计划中,呼吁将文化置于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核心地位;组织专家开展2030文化可持续发展指标框架(简称“Culture 2030”)的研究制定,为各国监测本地区文化可持续发展能力提供指导原则和建议。文化的作用既是直接促成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推动力,也是促成发展干预措施的有效性的推动者。^[18]因此,文化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驱动力”和外“推动力”。

综上,在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纳入文化维度,可避免将过多的注意力仅放置于经济增长维度,忽视人们对生活多样性的追求与渴望,忽视文化是一种创新和能动性生产的力量。文化可持续发展的综合考量,也提醒我们:不仅需要关注经济价值的贡献和衡量,还要重视其他价值,如文化、社会、审美等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因此,无论是艺术行业领域,还是国家、城市发展,都需要从生态文明、从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视角出发,将目光投向长期可持续乃至社会整体发展问题,连接历史、当下及未来。客观来说,无论是国际社会还是国内,对于文化在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中的作用及地位,关注及重视程度都是不够的。基于文化的方法、艺术行

动、文化创意产业所能达致的目标也还在探索之中,相关的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比如,“城市、文化和创意”发展框架(简称“CCC框架”),即为城市“利用文化和创造力促进可持续性发展和包容性增长”设计的行动指南。^[19]无论是“Culture 2030”还是“CCC框架”,其中均有可借鉴的知识经验,但立足中国实践的认知、分析、评价及新的探索仍不可或缺。这个新兴领域有待我国学界和业界深耕、拓展。

参考文献:

- [1]乔纳森·帕奎特,埃莱奥诺拉·雷达利.艺术管理与文化政策研究[M].耿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
- [2]Cultural policy, A preliminary study [M]. Paris: UNESCO, 1969.
- [3]王婧.国际文化政策研究学理观察——基于《文化政策国际期刊》[J].中国文化产业评论,2021(1): 197-217.
- [4]高迎刚,丛晓煜.中西文化交流视野中的“艺术管理”概念辨析[J].民族艺术研究,2021(3): 61-71.
- [5]周建新.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改革报告(2023)[J].艺术学研究,2024(2): 35-43.
- [6]周计武.艺术体制的现代性逻辑[J].文艺争鸣,2019(10): 86-93.
- [7]Unesco: Re|Shaping Policies for Creativity: Addressing culture as a global public good[R/OL]. [2024-01-18].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80474?2=null&queryId=a32b0026-6674-4fd9-89b9-8afa2d73d5b4>.
- [8]西沐,路昕.数字经济背景下艺术管理学科再造研究[J].艺术管理(中英文),2023(3): 49-65.
- [9]林一.文旅融合中的艺术管理学科发展[J].艺术管理(中英文),2022(3): 39-42.
- [10]新华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杭州宣言:文化与可持续发展”[R/OL]. (2013-05-17) [2024-01-28]. https://www.gov.cn/jrzq/2013-05/17/content_2405169.htm.
- [11]AEA Consulting. 2022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Index[R/OL]. (2023-07-27) [2024-01-28]. https://aeiconsulting.com/uploads/1400014/1690285852281/AEA_CII_2022_Web_Final.pdf.
- [12]王璜生,沈森.“新美术馆学”的历史责任[J].美术观察,2018(9): 121-123.
- [13]张子康,罗怡.美术馆的新角色: AI&人&艺术的智识共同体[J].美术观察,2023(8): 13-16.

- [14]刘洪一. “界”的范畴意义与工具价值[J]. 哲学研究, 2021(11): 66-76.
- [1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 创意经济与城市更新(2019-2020)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11.
- [16]新华社研究院.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R/OL]. (2023-12-03) [2024-01-26]. http://www.news.cn/politics/2023-12/03/c_1130006373.htm
- [17]傅才武, 秦然. 中国文化治理: 历史进程与演进逻辑[J].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3): 11-22.
- [18]杨越明. 如何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文化可持续发展水平——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指标建构[R/OL]. (2022-04-09) [2024-02-15]. <https://mp.weixin.qq.com/s/PINECIrQM-EU27GXJaZKAw>.
- [19]Cities, culture and creativity: Leveraging culture and creativity for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and inclusive growth[R]. Washington DC: UNESCO and the World Bank, 2021.

【责任编辑 刘红娟】

Frontier Issues and Research Trends of Arts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Policies in A New Era

REN Jun

Abstract: Current research on arts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policies in my country includes both global propositions and many Chinese practical issues that are difficult to learn from Western experience. Its problem awareness and research trends are always intrinsically linked to cultural policies and cultural system reform practices in the new era. The accumulated experience in arts management practice has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deepening cultural policies and progressive cultural system reform. Cultural policies provide specific provisions, strategies and plans for coordinat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lations in arts management. Explain changes in relevant concepts, objects and environments, explore the profound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refocus on the essential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arts. These concerns about the internal ecology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arts and the changes in the times. These become problem awareness and research topics in arts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policies. Various new forms and new problems urgently require changes in traditional arts management, and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policy plans also urgently need to be adjusted and optimized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so as to ultimately achieve the goals of aesthetic value and social value. Based on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 laws and social functions of the fields of arts management and cultural policies, it reveals that China's current academic circles need to focus on: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creativity and humanistic economy, cult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other research areas. These research scopes not only come from China's practical experience, but also absorb and draw lessons from the areas of discourse that are generally focused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y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uiding future relevant practices and conducting international academic dialogue. From a macro and holistic perspective, future innovative practices in arts management should be directed towards long-term sustainability and even overall social development. It needs to connect history, present and future.

Keywords: arts management; cultural policies; problem awareness; innovative practice